

六朝志怪小说选译

本书责编：周田青
封面设计：陈世丘
版面设计：盛寄萍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巴蜀印刷厂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印刷一厂
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套

ISBN 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元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学者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一

从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经过三国、晋、宋、齐、梁、陈，大约三百余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六朝时期。这个时期，不仅诗歌、散文、乐府民歌等获得了丰收，而且小说创作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我国古代小说有文言和白话之分。六朝时期的小说属于文言小说。这个时期的小说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一类是杂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志人小说，或称轶事小说、清言小说。其中尤以志怪小说为大宗。

志怪小说在六朝时期开始大量产生和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志怪小说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是六朝的社会现实给志怪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起了催化的作用。

志怪小说的孕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古代的神话是以神为中心的，充满了神奇的幻想和大胆的虚构。传说虽然有一些历史事实的影子，但经过人们用幻想进行加工，也常常带上怪异的色彩，有些历史人物就成为神化了的英雄。经过史传记载，进而不断补入新的幻想，那些怪异的故事就得到了流传，或成为志怪小说的材料，或对志怪小说产生影响。

我国古代神话和传说没有专辑，但是散见于先秦各类古籍中的还是很丰富的。在秦汉以前出现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就有不少神话和传说的记载。《山海经》专记海内外山川异物。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说它：“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穆天子传》是记周穆王驾八匹骏马，北驰流沙，西登昆仑，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六朝志怪小说与这两本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此外，六朝志怪小说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影

响。诸子百家、屈宋辞赋、史传文学、民间创作，也都有着极为丰富的想象，不少作品也是虚幻设言，带有一些怪异成分，给志怪小说提供了营养和借鉴。特别是六朝时期文学创作的蓬勃局面，不可能不给志怪小说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

关于六朝志怪小说大量产生发展的社会原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过确切的说明。他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六朝时期，除西晋有一个短暂的统一局面外，南北长期对峙，政权处于不断更迭之中。频繁的战争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社会生活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人多抱厌世主义”（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加之六朝统治者醉生梦死，大力提倡宗教迷信，于是，道教佛教的势力就得到了大大发展，影响及于社会各个阶层。统治阶级的士族，“皆讲超脱现世”（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有的信奉道教，妄想长生不死，羽化升天。有的皈依佛门，寄希望于未来，寻求心灵上的解脱。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

动人民，或想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或出于祈福消灾的愿望，他们也往往寄希望于鬼神。同时，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还通过鬼神故事来抨击统治阶级，表达反抗的意志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这就为志怪小说的大量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社会现实的基础。

六朝时期，写志怪小说蔚然成风，作者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因此，志怪小说数量很多，经后人辑录而保存至今的尚有三十多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旧题魏文帝曹丕的《列异传》、晋张华的《博物志》、晋干宝的《搜神记》、晋王嘉的《拾遗记》、晋荀氏的《灵鬼志》、旧题晋陶潜的《搜神后记》、宋刘义庆的《幽明录》、宋东阳无疑的《齐谐记》、齐祖冲之的《述异记》、齐王琰的《冥祥记》、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

六朝志怪小说对于后世的文学作品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孕育了唐代传奇，而且以丰富的内容和想象浇灌了其他门类的文学作品。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就是由《搜神记》和《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发展而来的。《幽明录》的《庞阿》采用离魂情节来表现爱情是非常奇特的，而唐代陈玄

祐的《离魂记》就吸取了这一情节。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和六朝志怪小说有直接渊源关系的，还有宋明清以来的志怪派小说。如宋代徐铉的《稽神录》、洪迈的《夷坚志》，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都属于这一类。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不难看出《聊斋志异》与六朝志怪小说之间的传承关系。

六朝志怪小说还常常被后代的诗、赋、小说、戏曲等吸取，大大丰富了这些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力。如李白的《白头吟》结尾说：“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见青陵台。”“青陵台”这个典故，就是出自六朝志怪小说《韩凭夫妇》。李商隐的《青陵台》说：“莫许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也用了这个故事。在赋中用这个故事的，有敦煌发现的唐写本《韩朋赋》。宋人话本中不少作品取材于六朝志怪小说。如《董永遇仙传》、《生死交范张鸡黍》、《西湖三塔记》，就取材于《搜神记》。至于小说、戏曲受到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就更明显了。如明清的神魔小说、侠义小说，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手法，大都受到六朝志怪小说的启示。甚至于《三国演义》这样的名著，也吸取了《搜神记》

的若干材料。鲁迅的历史小说《铸剑》是从《三王墓》发展来的。戏曲如元代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来源于《庞阿》，关汉卿的《窦娥冤》是根据《东海孝妇》改编的。明代汤显祖的《邯郸记》取材于《焦湖庙祝》，而《牡丹亭》则吸取了《徐玄方女》和《李仲文女》两个志怪故事的素材。现代一些传统剧目，也与志怪小说有关。如我们熟知的黄梅戏《天仙配》，就来自《搜神记》的《董永》。

二

六朝志怪小说多记鬼物奇怪之事，因此，侈谈鬼神，称道灵异就成了它的基本内容。作者写志怪小说的目的，或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证明鬼神之实有，如《搜神记》之类；或在于“自神其教”，进行宗教宣传，如《冥祥记》之类。这就使六朝志怪小说包含了许多虚诞怪妄之说。但是，六朝人写志怪小说，不是进行刻意创作，而是把怪异当作事实来记载。在他们看来，鬼神实有。鬼神与人一样，都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他们把所听到的传闻记录下来，进行整理，所以有些作品能够反映社会的现实生活，表现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情感，仍有较高的思想性。我们在阅读时，

要透过鬼神虚幻的帷幕，看到它曲折地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

六朝志怪小说中，有一些作品是很动人的。它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如《三王墓》写干将为楚王造剑被杀，儿子赤比不惜生命献头，山中客见义勇为，终于报仇雪恨。写出了人民互相支持，英勇反抗的精神。《东海孝妇》反映了劳动妇女对封建制度残杀无辜的控诉。而《怨碑》一篇，则直截了当地记下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抗议。还有一些作品表现了人民群众的高贵品质。如《董永》写穷苦青年董永的孝行感动天帝。《白水素女》与上篇旨趣基本相同，但情节更为曲折，故事更加感人。白水素女实际上是一个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勤劳、善良，对弱者富于同情心。这正是我国古代妇女所具有的美好品德。《韩凭夫妇》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赞扬了韩凭妻何氏不慕富贵、威武不屈的高尚品质。至若《李寄》，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它塑造了一个英勇机智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的形象，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教育意义。

封建统治阶级穷奢极欲，醉生梦死。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满足其荒淫无耻的生活，对劳动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干出了种种罪恶的勾

当。六朝志怪小说从各方面揭露和抨击了这些丑恶现象。《李除》和《弘氏》深刻地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前者抨击了贪官污吏公开索贿，后者鞭笞了迎合朝廷旨意，罗织罪名，陷害无辜的恶吏。《藻兼》写汉武帝大兴土木，闹得鬼神不安，竟向他诉苦，穷苦百姓遭受的灾难就更不用说了。其讽刺意味显而易见。《薛灵芸》反映了封建帝王选美给民间带来的骨肉分离之苦。她玉唾壶中如血的红泪，是被掠夺的良家子女灾难的象征。而《翔风》则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先宠后弃的悲惨遭遇。在贵族官老爷的眼里，妇女只不过是寻欢作乐的玩物。这些作品，无疑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控诉。

还有一些作品，或写人神恋爱，或写人鬼通婚，或写死而复活终成夫妻。如《天上玉女》、《卢充》、《李仲文女》、《清溪庙神》、《谈生》、《紫玉》、《河间郡男女》等，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类作品所写的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故事，是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不合理的反映。尽管作者写人神、人鬼通婚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神、人鬼交通，但是，实际所表明的却是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具有反封建的意义。

从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社会现实，是志怪小说更为广泛的主题。

六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的时代，统治阶级混战不休，而人民群众流离失所，生活痛苦不堪。他们渴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袁相根硕》、《刘晨阮肇》这类“桃花源”式的作品，就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这种愿望和要求。志怪小说写出了六朝时人民最关心的现实问题，无愧于它所处的时代。再者，在宗教大肆宣传鬼神魔力时，产生了一些不怕鬼神妖怪的作品，如《宗定伯》、《吕思杀狸》、《宋大贤》、《安阳亭书生》、《章荀》、《顾邵》等。这些作品都说明鬼神妖怪不可畏，只要不怕恫吓讹诈，具有机智和勇敢的精神，就一定能战胜鬼神妖怪。这也是现实生活中两种思想的反映。至于社会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友情问题、家庭问题、个人志趣问题，在六朝志怪小说中都有所反映，有过不少好作品。

最后要谈到的，是“释氏辅教之书”。这类作品在六朝后期大量出现，在志怪小说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类作品，主要是进行宗教宣传，或写天竺故事，或写因果报应，或写生死轮回，或写普济众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作者的目的所在，是很清楚的。但是，它

既然是时代的产物，就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六朝时期，佛教已深入民间，据范缜《神灭论》记载，当时一般老百姓也往往“竭财以趣僧，破产以趋佛”，对佛教的崇敬竟到了狂热的程度。志怪小说的这类作品，也可以从侧面帮助我们认识那个遥远的年代。如《舒礼》写信奉佛教的好处，劝谕世人皈依佛门。但是，从这篇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六朝时期的宗教派别之争。又如《赵泰》一篇，是最早写善恶报应、生死轮回的，对后世文学有一定的影响。

三

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还处在小说发展的童年时期。它一般只是“粗陈梗概”，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人物形象也大多缺乏细致的刻画，各方面都还带着一股稚气。但是，这个时期志怪小说所具备的小说因素，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初步形成。它在很多方面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

有些作品情节结构比较完整，已开始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如《李寄》始写大蛇危害严重，官吏昏庸无能，巫祝愚昧残忍；次写李寄意志坚强，勇敢机智，终于为民除害。情节发展自然，故事结构